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
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
漢文寫卷敘錄

下 册

孟列夫(Л.Н.緬希科夫) 主編
M.I.沃羅比耶娃 - 捷霞托夫斯卡婭
左義林(И.Т.佐格拉夫) A.C.馬爾蒂諾夫
孟列夫 Б.Л.斯米爾諾夫編撰

袁席箴 陳華平 翻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

М. И. ВОРОБЬЕВА-ДЕСЯТОВСКАЯ,
И. Т. ЗОГРАФ, А. С. МАРТЫНОВ,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Б. Л. СМИРН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ДУНЬХУАНСКОГО ФОНДА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выпуск 2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7

附 錄

一、論敦煌寫卷的日期標注法

敦煌寫卷的日期標注法問題，是與敦煌寫卷解說目錄有關的最複雜的問題之一。說其複雜，首先在於，公元一千年內的中國古文字學，迄今尚未進行充分研究，而且也沒有一條根據外觀特徵來確定寫卷年代的切實可行和確切的科學原則。中國和日本有一些專家雖然有能力標注寫卷的日期，但也未能提出這種原則。因為他們的知識，只不過是實踐技能而已，尚未歸納形成為科學著作。

涉及到公元一千年內的古文字學方面的文獻資料，少得可憐，而且純屬經驗之談。例如，鄭振鐸編輯的著名的《中國歷史參考圖譜》^①是一部古代某些物品的圖片集（如建築物、塑像、彩色畫、工具、陶器、書面文獻、印刷品），附有很簡要的說明，如“寫于唐宋年間的八件寫卷”或“千佛洞中的古代寫本殘卷”^②等。顯然，這些圖譜只能對某一時期的物品或書面文獻給以最扼要的說明，而且這些圖譜還不是彩色的。此外，在圖譜的說明中，也未提及對標注日期極為重要的資料，如紙色和紙質、紙上有無網格及其特徵。因為字體不一定能精確地說明時代，所以缺少這些特徵是無法標注寫卷日期的。因此，這部唯一編有古文字學資料的參考書，提供的資料是不充分的，只能作為最籠統地確定寫卷年代的指南。

歐洲人研究敦煌寫卷古文字學問題的學術著作，為數也極少。

有 R. H. 克拉珀頓撰寫的研究紙質的短篇學術論文^③及 L. 翟理斯論述標定敦煌寫卷日期的一套論文集^④。R. H. 克拉珀頓在其學術著作中指出中國 406—991 年各個時代敦煌紙質的一系列特點，對於從古文字學上確定寫卷的年代是很重要的。例如紙色，染色特徵，紙的微測厚度(到千分之一英吋)，紙的致密度，每英吋的網格綫數，網格有無豎連線及其密度，紙質是否發脆，紙面特徵，纖維研磨破碎程度，造紙的材料。R. H. 克拉珀頓共研究了 15 件寫卷，其全部目錄也可以在倫敦敦煌文獻館的藏品目錄^⑤中查出；L. 翟理斯在其上述論文集中僅援引了描述紙質基本特徵的摘錄，其年代分別為 406 年，506 年，561 年，593 年，673 年，710 年，756 年，803 年，875 年，929 年，968 年，989 年，991 年。然而，L. 翟理斯所描述的標定日期寫卷的紙質與 R. H. 克拉珀頓測定的數據並不一致。無論在論文集中，還是在解題目錄中，翟理斯僅限于指出紙色，間或也指出紙的厚度，但未反復進行測量。同時，他也並未試圖根據字體和紙質來標定寫卷日期。由於這種緣故，他的論文及敘錄，往往不能為研究敦煌寫卷提供古文字學必要的資料。因此，要論證日期，我們往往需要使用我們自己的資料，或使用克拉珀頓的資料，間或使用鄭振鐸編輯的《圖譜》。

我們先從我國所藏敦煌文獻寫卷作起，因為這些寫卷上標有日期，因此可以作為標準，對類似的寫卷加以比較。在我們已分類整理的部分藏品中，這種寫卷為數不多。現將這些寫卷一一列出，并就對標注日期問題重要的資料加以簡要說明(列舉寫卷以年代為序，先寫入藏號及本書編號，再標定日期，說明必要的資料^⑥)。已注明日期的所有寫卷中，字體幾乎均為楷書，沒有隸書筆意。某些更古老的寫卷也可能標注有日期。

Φ-320 號寫卷(本書 2245)，《[大]方等無想大雲經》，卷第六。紙色褐(發黑)。紙質脆而厚。網格模糊不清，每釐米 6—7 條綫。紙面光滑。紙厚 0.12—0.16 毫米。寫卷尾附記日期為：“緣禾三

• 522 •

年歲次甲戌九月五日”。寫卷書寫字體為隸書，與鄭振鐸《圖譜》中影印的 1 件 5 世紀寫卷^⑦裏的字體相似。寫卷用紙也是 5 世紀特有的，當時通行的紙是：紙質厚，無染色，紙面光滑，色調從微灰到微褐不等^⑧。在中國年表參考資料中沒有緣禾年號(其中“禾”同“和”)。5 世紀的上述干支年份甲戌，相當於延和三年。雖然“延”字寫作“緣”字的原因不明，但“緣禾”很可能就是“延和”。這樣該寫卷的標注日期為 434 年 10 月 23 日。該寫卷的資料同 L. 翟理斯對 5 世紀寫卷用紙特徵的描述是完全吻合的，例如克拉珀頓研究過的 406 年的 1 件寫卷(S.797)^⑨。但是，必須指出的是，5 世紀的寫卷還有一個特點，翟理斯並未提及。這就是畫行，其中豎綫表示字行，橫綫打出天頭和地腳。畫行綫是照直尺劃的，與寫卷墨迹相同，使用的很可能是毛筆。畫行綫較粗，且不勻，帶有墨迹。有詩文的佛經寫卷中，橫詩欄彼此用橫綫隔開。在鄭振鐸的《圖譜》^⑩中可以找到橫綫的範例。在我國的藏品中，這種寫卷也有很多。如果說在 8—11 世紀的寫卷中，特別是未收入佛教正經的書目中，往往使用粗畫行，則 5 世紀之後未見有橫綫。這是因為，在較晚期的寫卷中，詩欄是以約一字寬的空格來彼此隔開的。在我國已分類整理的部分藏品中，上述寫卷是 7 世紀以前唯一標有確切日期的 1 件寫卷。此外，在這部分藏品中，看來還有一些更早期的寫卷。例如，Дх - 2111(本書 2275)寫卷，即《維摩詰經》殘卷，就是這種早期寫卷。3 世紀支謙譯，5 世紀出現鳩摩羅什的同一佛經譯文後不再通用。該寫卷的字體，在我國藏的全部寫卷中也許是標準的隸書。字體中幾乎沒有細筆道，而且這種字體的特點是，各筆畫都是渾厚有力的粗筆道，有較明顯的頓筆。此外，某些漢字形體或其部分筆畫很別致，是 5 世紀以前特有的，後來未再發現。例如，把部首“艹”寫作“艸”，就是這種形體(在時代較晚的寫卷中，這種形體僅見于行書和草書)，如：“薩”寫作“孽”，“師”寫作“師”，“滿”寫作“𦵹”，還有許多其他漢字。有些漢字中，往往筆畫交叉，而後

• 523 •

來僅僅連接而已。例如，漢字“子”，5世紀寫作“子”。一些漢字的某些筆畫與時代較晚的形體不同。例如“五”字，在早期字體中寫作“五”。該寫卷紙色褐，紙質厚，紙面光滑，厚0.09—0.14毫米。紙上無網格，但克拉珀頓描述的所有5世紀寫卷均有網格。據上述種種原因，我們傾向于把該寫卷列入4世紀或5世紀初^⑩。

在我國的藏品中，現在尚未發現任何1件標注日期為6世紀的寫卷。因此，在標注日期時，除了我們自己所取得的經驗外，我們不得不依據克拉珀頓及翟理斯的資料。克拉珀頓為6世紀的紙確定了兩種基本類型，其基本特徵如下：

對於6世紀前半葉的寫卷，在描述倫敦藏品中標注日期為506年的S.81號寫卷（翟理斯《敘錄》，1725）時，克拉珀頓寫道：“紙質很薄，富有彈性，為‘銀行券型紙’，紙色淡棕^⑪，紙兩面均很光滑，厚0.002—0.0025英寸（即0.05—0.06毫米——孟列夫注），紙質脆而透亮，網格很密，每英寸約24—26條綫（每釐米10條綫——孟列夫注），綫條勻整平直。網格似乎是用很細的草莖或竹莖造紙時形成的。網格的連綫很細很直，彼此相距約半英寸（間隔約1.3釐米——孟列夫注）”^⑫。在我國的藏品中，也可見到有同樣紙張基本特徵的寫卷，例如Дх-623號（本書572）殘卷。該寫卷的字體與上面描述的寫卷相比，不能認為是隸書，而近似於現代字形。但是，這種字體明顯地包含有許多隸書筆畫。這種字體有以下趨勢，第一是字體趨向扁長，第二是長橫末端變得粗厚，第三是豎、撇、捺粗筆畫遒勁有力。這種字體大體上介於原來的隸書與現行楷書之間。Дх-38號（本書575）寫卷及其他許多寫卷都屬於這種字體。

把這類寫卷的字體與其他一些寫卷相比較，我們便可發現，還有一些寫卷，其紙質資料與剛剛描寫的寫卷是不一樣的，但從這些寫卷的字體特徵倒能够推測出，這些寫卷是屬於同一時期的，即屬於6世紀前半葉。例如，Дх-557號（本書573）就是這種寫卷。在

這件寫卷中我們可以看到，字體酷似Дх-623號（本書572）和Дх-38號（本書575），但該寫卷的紙質却不同：紙色褐；紙質薄而脆；紙兩面均不光滑；厚0.055—0.07毫米；網格每釐米7—8條綫。有同類字體的Дх-564號（本書577）寫卷中，紙質同上。這種紙的特點，同樣是未染黃色。顯然，在6世紀前半葉在使用染色紙的同時，也使用未染色紙（或者，這種紙的染色為褐色或淡褐色）。L.翟理斯在其論述標定日期寫卷的幾篇論文中也證實了這一點。在這幾篇論文中，對標定日期為513年的S.2067號及S.341號寫卷紙張基本特徵的描述分別是，“紙染為淡棕色”及“紙質脆，染為棕褐色”^⑬，儘管沒有一處專門說明有這種紙。

在6世紀初葉的寫卷中出現了一種新型畫行，劃綫用墨與寫卷用墨相同，綫條很細，沒有5世紀特有的浮筆或粗筆。顯然，這裏使用的是一種比毛筆更細的書寫工具。可能是劈細的竹箋。把橫排詩欄彼此隔開的橫綫（由於自上至下書寫而）不再使用了，而出現了以上已說過的橫排詩欄之間的空白。其實，這種空白還是在5世紀後半葉就已經出現了，鄭振鐸援引的461年的1件寫卷^⑭就已證實了這一點。從這時起，橫畫行（不包括天頭地腳綫）在敦煌寫卷中就再未見到過。

6世紀後半葉出現了一種新型紙，翟理斯在541年的1件寫卷（S.2216號）中首次提到，對其基本特徵的描述是，“紙質薄而脆，染為美觀的金黃色（是後一世紀特有的紙）”^⑮。克拉珀頓也對該寫卷作了詳細描述：“紙質薄，紙色金黃……，厚0.002—0.0025英寸（0.05—0.06毫米——孟列夫注）。紙質又薄又很美觀，做工精良，纖維研磨細碎。紙頁黏合良好。網格很勻整，連綫成直角……，每英寸16條綫（每釐米6—7條綫），連綫間隔2英寸（4.5—5釐米）。紙質又厚又結實，半透亮，做工很平整。紙面勻整細密。保存得非常完整，仍有清脆的響聲”^⑯。翟理斯也指出，這種新型紙“色調不太尋常，有橙黃、藍暗黑、微綠褐、粉紅或微粉紅、微綠黃

等”^⑩。在我國的藏品中僅僅發現有黃色紙的各種色調(金黃、微褐黃、微綠黃)。在任何情況下,根據紙的厚度、做工很勻整的紙面、清晰的網格及橫線,這種紙與其他各種紙很容易加以區別。

這類寫卷中的字體,有兩種主要類型:一類是隸楷,一類是楷書。隸楷略帶隸書筆意,但不像隸書,更近似于楷書;楷書則毫無隸書筆意。由於這種新型紙也用于7世紀前半葉,所以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翟理斯所述,在同一時期“各種字體一般風格發生明顯變化,起始于6世紀後期,毫無疑問是由于筆法的某種發展引起的”^⑪。因此,這種字體風格本身,就能夠把6世紀下半葉的寫卷與7世紀前半葉使用同一種紙的寫卷,明顯加以區別。可能是翟理斯有所疏失,把6世紀和7世紀的紙混為一談了。下面描述我國所藏的Φ-696號(本書647)寫卷時還要談到這一點。寫卷中的畫行,從6世紀後半葉起就不像以前我們所見到的那樣了。綫條與6世紀前半葉的一樣,可能也是用竹箋劃的,同樣又細又勻整。但是,如鄭振鐸教授解釋的那樣,劃畫行用的墨色較淡,因此綫條猶如鉛筆劃的一樣,而且,劃得特別細心時,綫條僅隱約可見。這種又細又淡的畫行,一直保持到8世紀中葉,此後綫條一般又用通常的墨色來劃,往往很粗。

對敘錄中標定日期為568年的S.616號寫卷的隸楷,翟理斯的描述是:“與上述成卷寫卷相比,字體略帶隸書筆意,介于六朝的古拙字體與唐代的秀麗字體之間”^⑫。這種字體僅保留了以前隸書筆畫中捺筆畫的強健粗壯,如果加以對比,還能區分出,可以標定為同一時期的幾種類型的紙。第一種類型的紙,與通常的金黃色紙不同,紙質薄而透亮,紙色微黃褐,紙質脆。厚0.055—0.07毫米。網格每釐米7—8條綫。紙質近似于6世紀初葉的褐紙,但比其透亮,染色色調更黃。屬於這種類型的是Дх-2561號(本書2219)寫卷紙。第二種類型的紙,紙質很薄,紙色淡黃,紙質微脆。厚度同樣是0.055—0.07毫米。網格每釐米6條綫。例如,Дх-

161號(本書603)寫卷紙就是這樣^⑬。金黃色薄紙在7世紀前半葉也可以看到,但是這一時期的寫卷與上一世紀寫卷的明顯區別是,字體中完全沒有隸書筆意。例如,對於602年的1件寫卷(S.3548),翟理斯寫道:“字體與現代字體極為近似。紙質又薄又脆,紙色金黃,質地極好”^⑭。如上所述,紙質基本特徵沒有發生變化,然而字體風格却變了。但是,在我國的藏品中,沒有1件寫卷是用上述質地的紙,從而可以列入7世紀的。可是,我國有1件Φ-696號(本書647)寫卷,寫的經文是佛經《大般涅槃經》,標注日期為“開九開十開十一年”。這裏很可能是指寫卷的抄寫日期(寫卷為經文的卷第三十二及卷第三十六),這件寫卷可能組成上述佛經的完整經文。附記中的上述開九開十開十一年,很可能相當於開元年號中的年份,即721年、722年、723年。該寫卷紙質薄而脆,紙色淺黃。其厚度不像我們在6世紀寫卷中所看到的,是0.05毫米,而是0.07—0.08毫米。網格同樣是每釐米7條綫,但沒有豎連綫。倫敦藏的7世紀初葉寫卷紙質到底如何,我們無法化驗,但可能是翟理斯有所疏失,把6世紀後半葉的紙與7世紀前半葉的紙混為一談了。

上述這種紙,遠非該時期唯一的一種紙。但各種紙均具有的特點是質量高,並染成各種色調的黃色。正如翟理斯所指出的,“在7世紀及8世紀部分時間裏,各寺院中使用的紙,表面依然是又薄又光滑,紙色淡黃或微褐黃;但在安祿山之亂(755—763年——孟列夫注)之後,質量大幅度下降,當時大部分紙逐漸變為紙面粗糙,紙色暗褐”^⑮。對於7世紀其中一種類型的紙(S.2573號及S.312號寫卷,均為673年),克拉珀頓的描述是:“紙色暗棕,做工很勻整。厚0.004英寸(0.1釐米——孟列夫注)。這種紙張,看起來就像破布造的紙一樣,因為根本就沒有可以透過紙張看得出的網格痕迹。在反射光下透視,網格模糊不清。紙面很光滑,沒有纖維。紙質厚,纖維短,比化驗過的該時期任何一種紙的纖維都

短。紙的半透光性也更強。手感很光滑”^②。因此，對於 7 世紀的紙，克拉珀頓鑑定為兩種類型，彼此的區別是厚度、網格、染色^③。而且，第一種類型的紙常用于 7 世紀前半葉，第二種類型的紙常用于 7 世紀後半葉。其實，第二種類型的紙，在 8 世紀也是通用的。

在我國藏品中常見的 7 世紀用紙還有幾種類型，克拉珀頓和翟理斯尚未專門進行研究，也未提及（翟理斯在其論述標注日期寫卷的論文所描述的寫卷中，這幾種類型的紙無疑是有的。但由于翟理斯一般僅僅指出紙色，因此，在大部分情況下不能把這些寫卷的紙同我國藏的寫卷紙相提並論）。

首先，我們注意到，在該時期有一種紙，紙質薄，紙色微褐黃，網格窄而勻整，每釐米 8 條線。例如，Дх - 2186 號（本書 2228）寫卷就是這樣，其字體絲毫沒有隸書筆意。這種紙比 7 世紀初葉常用的金黃色紙稍微厚些，紙厚 0.075—0.085 毫米。其次，有一種淺黃色紙，厚度與上一種紙大致相同（0.095—0.11 毫米），只是網格稍寬而勻整，但不清晰，每釐米 7 條線。紙面不太光滑。Дх - 2742 號（本書 2226）寫卷就是這樣。第三種類型，紙色黃，紙質軟，比上述兩種類型的紙薄，但比金黃色紙厚，其網格勻整，但不太清晰，每釐米 7 條線。紙面光滑。可作為範例的是 Дх - 754 號（本書 637）寫卷，該寫卷紙厚 0.05—0.065 毫米。上述這三種類型的紙，看來全部屬於 7 世紀前半葉。這是因為，薄紙在 7 世紀前半葉較之在 7 世紀後半葉更具有代表性。在公元 7 世紀的寫卷中，有些寫卷用紙較厚實，其基本特徵近似于上面援引的克拉珀頓（對 673 年寫卷）的描述。除了沒有網格、表面光滑的這種紙以外（例如 Дх - 1107 號與克拉珀頓描述的那種紙類似），還有一種相當常見的紙，紙色暗黃，紙質厚，但其網格很窄很勻整，清晰可辨，每釐米 10 條線，豎連線彼此間隔 4.5—6 釐米。紙厚 0.09—0.1 毫米。我們發現，翟理斯所說的那種紙面油光的特點，可能是這種類型的紙最突出的特點。例如，Дх - 1871 號（本書 2229）寫卷紙的特點就

是這種油光性質。我們把這三種類型的紙幾乎全都歸為 7 世紀，只是認為這種可能性最大，因為在這些寫卷中，除了 Φ - 68 號（本書 1289）寫卷外，沒有 1 件寫卷標注有日期，而翟理斯的幾篇論文也未提出可以等同起來的條件。上面研究的三種類型的紙，由於全都染為不同色調的黃色，同 6 世紀出現的質地又薄又脆的濃金黃色紙及微褐黃色紙有明顯區別，所以全都可以合并為一類。這三種類型的紙，也沒有 6 世紀到 7 世紀初葉紙張特有的那種清脆響聲。發出清脆的響聲，大概是由于苧麻纖維引起的。正如克拉珀頓所證實的那樣，苧麻纖維以前是造紙成分，而 7 世紀已不再使用。

此外，7 世紀末葉還遇到有幾種未染色的紙。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出，染色紙主要見于列入佛教正經“經藏”的寫卷，很少見于列入佛教正經“論藏”和“律藏”的寫卷。而其他作品，如注釋（包括對佛教經典的注釋）、摘錄匯編、詩體經文、非佛教經典作品、歷史文本等，通常均用未染色紙書寫。很有可能高質量的黃紙很貴，因此，佛教徒選定黃紙用于錄寫他們崇敬的佛教正經的經典寫卷。

我國的藏品中有 1 件 Φ - 68 號（本書 1289）寫卷，標注日期為“儀鳳三年八月十二日”，即 678 年 9 月 3 日，是《維摩詰經》注釋卷第三，標題為《維摩疏》。寫卷字體為楷書，有的地方為新行書。紙色白，微發黃；紙質軟，表面柔軟光滑；厚 0.17—0.19 毫米；網格勻整，每釐米 6—7 條線；豎連線不勻整，間隔 2.5—8 釐米不等。無論是克拉珀頓，還是翟理斯，對 7 世紀的這種紙均未進行詳細描述。這種紙可能類似于 S. 2863 號寫卷紙，對其基本特徵的描述是：“紙面粗糙，未染色，但相當結實”^④。

對標定寫卷日期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在位帝王或晏駕帝王名字中的諱字。使用諱字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換用另一個與諱字同義的字，一種是寫一新字代替禁用的諱字。例如，唐太宗登基（627—649 年）後，因為太宗皇帝的本名是李世民，所以“世”和“民”

二字便不能使用了。當時便把“世”字寫作同義的“代”字，把“民”字寫作“人”字。“民”字也可以不寫最後一筆成“艮”字。在寫卷中換寫某些諱字，可以確認該寫卷的書寫日期不早于皇帝登基年份或其太子登基年份^②。至于哪些避諱，截止到什麼時候，的確是難以說清的。但是，避諱倒可以使日期標定限于一世紀內。如果我們遇到的是某一短期王朝的皇帝，那麼，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例如五代時期(907—959 年)的一些國君，當時，在短期內換了五個朝代。此外，還有一些未編入官方編年史的許多小國。

有時，借助諱字，還可以確定寫卷可能書寫的最晚日期。例如《維摩詰變文》之一部分，標題為《維摩碎金》，入藏號為 Φ - 101 號(本書 1473)，該寫卷附記中指出，講經和尚名為匡胤。他的名字，與 960 年登基的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的名字完全相同。很明顯，趙匡胤登基後，匡胤和尚或者改換自己的名字，或者把自己的名字改變形體。由於寫卷中既未改換名字，又未改換形體，所以可以確認，該寫卷的書寫日期不遲于 960 年^③。

7 世紀末葉，寡太后武后篡奪唐朝皇位，從 684 年至 704 年執掌朝政。她在漢字方面進行了獨特的“改革”，下令把許多詞義涉及天、地、人及天子、平民關係的字進行改造。根據中國古代哲學的理解，天、地、人是宇宙的開端。如果寫卷中出現這些字，那麼就可以有把握地把這些寫卷歸為武后執政時期，因為她所規定的字形，無論在她之前，還是在她之後均不使用(如果她使用的古代字形不算在內，但這些古代字形在紀元前就已經不通用了，因而在其他寫卷中不可能有這種字形)^④。參看附表一，表中列舉了我們所知道的武后執政時期的全部字形^⑤。

出現有武后執政時期的字，還能確定 7 世紀末 8 世紀初的幾種類型的紙，其中有的用于佛經寫卷，有的用于其他寫卷。

我國收藏的敦煌寫卷，往往僅有附表一中列舉的某些字。例如：Φ - 4 號(本書 133)寫卷，《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一十

二，有本書附表一《武后執政時期(684—704 年)規定的漢字》中序號 2、8 的兩個字(即“地”、“正”)。寫卷背面有日期：辛酉年八月十七日，大約相當于 721 年 9 月 12 日。該日期很可能是這件寫卷寫完後幾年才寫上去的；Φ - 5 號(本書 150)寫卷，佛經名同上，卷第五百七十四，有序號 8、14 的兩個字(即“正”、“證”)；Φ - 12 號(本書 156)寫卷，佛經名同上，卷第五百九十二，有序號 9 的字(即“臣”)；Φ - 29 號(本書 98)寫卷，佛經名同上，卷第三百六十四，有序號 1、2、8、14、16、17 的六個字(即“天”、“地”、“正”、“證”、“人”、“聖”)；Дх - 49 號(本書 142)寫卷，佛經名同上，卷第五百四十八，有序號 8 的字(即“正”)及其他字。上述佛經的所有寫卷紙質均為：紙質厚，稍脆；紙兩面均光滑；網格每釐米 5—6 條線；豎連線間隔 5—6 釐米。各件寫卷紙的厚度介于 0.095—0.135 毫米之間。紙色取決于染色，因而有各種顏色：微黃(未染色紙)、淺檸檬黃、淺黃、微褐黃(因時間長久及空氣和水分的作用而發黑)。但是，各寫卷用紙的表面特徵均類似。

使用另一種類型紙的有 Дх - 835 號(本書 845)、Дх - 1370 號(本書 1160)、Дх - 2152a 號(本書 2432)、Дх - 2557 號(本書 2433)寫卷，均為同一寫卷的一部分，內容是《四分律》各部分中的摘錄。各寫卷的紙質為：紙面粗糙，不勻整；紙色微褐灰；厚 0.12—0.225 毫米；網格不清晰，有的地方看不見，每釐米 5 條線。寫卷中遇到的，有武后執政時期的序號 8、12、16 的三個字(即“正”、“國”、“人”)。

這兩種基本類型的紙，主要是紙質厚，網格每釐米 5—6 條線，染成各種黃色色調，一直沿用到 8 世紀中葉。翟理斯認為，這兩種紙的消失是安祿山之亂引起的後果。但也有個別實例是較晚期的寫卷，使用的是同樣紙質的紙。例如 S. 717 號寫卷(翟理斯《叢錄》，3006)和 S. 5354 號寫卷(同上目，2316)，前者日期為 756 年，後者為 759 年。至少倫敦藏品中這一時期紙質的基本特徵，可能幾

乎全部與這兩種類型的紙相符^⑨。

8世紀中葉出現了一種新型紙，在我國藏品中登記為Ф-235д號(本書586)寫卷標注日期為：天寶十二載七月九日，即753年8月12日。該寫卷背面還有一個日期：天寶十二載十一月廿四日，即同年12月23日^⑩。紙色白，略帶微黃色調。紙質又薄又軟。紙厚0.11—0.125毫米。纖維搗得不細。這種紙常見于非佛教正經作品的寫卷中。該寫卷同樣也是各種佛經的摘錄^⑪。

8世紀還有一種類型的紙，用于書寫未收入佛教正經的作品的寫卷，如Ф-256號(本書1456)寫卷，標注日期為：大曆六年五月，即771年6月或7月，內容為7世紀初詩人王梵志的一百一十首詩，標題為：《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該寫卷的紙質，大體上與上一寫卷的紙質類似，同樣沒有網格。Ф-256號寫卷紙的特點是，紙厚0.135—0.145毫米，有分為兩層的趨向。

此外，在標注日期為8世紀的寫卷中，有許多是文書(信函、田簿、債契、社司轉帖、官方文書等)，其紙質不僅與佛教正經經典著作，而且與非正經著作寫卷使用的紙質都有很大差別。後者，即非佛教正經著作，雖然一般是寫在劣質紙上，但其紙質仍然相當薄，相當結實，紙面在一定程度上是勻整的，尚不能稱為粗紙。而文書用紙，通常是粗紙，紙質更低劣。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為，文書的作用是暫時的，轉眼即逝的，如使用昂貴的優質紙，就當時來說，還是一種不可容忍的奢侈行為。可以算作例外的，僅有幾件信函用優質紙書寫。然而，這裏顯然是為了表示對收信人的尊敬。用低等劣質紙寫的，還有大多數使用一年就失效的日曆，以及抄寫數量相當大，很可能是作各種袖珍祈禱書的陀羅尼經。很可惜，雖然在倫敦藏品中有相當多已標注日期的寫卷(約50件)，但在翟理斯編的日錄和各種論文中，以及克拉珀頓的學術著作中，均未描述8世紀用的這種粗紙。而我國的藏品中，我們發現了2件標注有日期的這類寫卷：Дх-354號(本書1631、1278、1639、1640、1656、

1650)和Дх-1328號(本書1570)。

編號為Дх-354的寫卷，其實是一疊彼此黏貼在一起的6件文書(6件文書按其排列的順序，自上至下標為6個附加號：а、б、в、г、д、е)。可以認為，6件文書的書寫時間大概是相同的。Дх-354е號寫卷上有日期：[開]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即721年12月7日。在Дх-354в號和Дх-354д號這2件殘卷上均有：十一月……，即和Дх-354е號殘卷上的月份相同。這疊6件寫卷，并非全都是用同一種紙書寫的。Дх-354а、г、е、д號這4件殘卷，紙型相同；紙色淡黃，微發褐。表面不光滑，纖維搗得較粗。網格又大又清晰，每釐米5條線，豎連線既不清晰又不勻整，間隔5.5—7.5釐米。紙厚0.085—0.115毫米。Дх-354е號寫卷，紙質類似，但紙色暗微褐，沒有豎連線，紙稍厚些(0.135—0.165毫米)。最後，Дх-354в號殘卷，紙色暗褐，微發青。手感很粗，纖維搗得很粗。網格每釐米5條線。紙厚0.145—0.165毫米。最後一種類型的紙，見于著錄的暫時只有這1件寫卷，而其他兩種類型的紙是常見的，也可以作為確定其他寫卷紙張年代的標準。倫敦藏品中的某些文書，顯然是用同一種類型的紙書寫的。例如入藏編為S.9714的信函殘卷，對其紙質的描述是：“紙色淡棕”^⑫。

8世紀(後半葉)的文書用紙還有一種類型，我們是在Дх-1328號寫卷中發現的。該寫卷是一份地畝青苗單，標注日期為：“建中三年三月廿七日”，即782年5月13日。寫卷用紙是：紙色淡黃，微發粉紅。纖維搗得不很細。該寫卷上裱貼有紙色相同、厚度不同的兩張不相同的紙(第一張紙平均厚0.095毫米，第二張紙厚0.085—0.09毫米)。第一張紙上網格大，每釐米5條線；第二張紙上網格小，每釐米8條或9條線。不同紙張上的網格大小不一，而且厚度不合標準，說明造紙工藝粗糙，因而紙價比較便宜。

描述9世紀寫卷的基本特徵時，我們發現了一個迥非尋常的特點。這一時期絕大部分標有日期的寫卷(我國藏品中已分類整

理的部分中，僅 1 件除外，倫敦藏品中，45 件寫卷中有 39 件^⑩，都是非正經著作，如偽經、注釋、佛教用語教程、詩歌，以及其他非佛教著作、尺牘、文書等。例外的是下列廣為誦讀的普及著作，如《金剛經》、《觀世音經》（《妙法蓮華經》中的第二十五品，是該佛經中最普及的一品）、《金光明最勝王經》。幾乎所有寫卷都是用劣質紙書寫的。這一時期幾乎完全沒有正經經典著作，大概是因為好紙很難買到，因而經卷的主管佛僧往往避免抄寫正經經典作品（最必須的作品例外）。紙質降低這一情況，在翟理斯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7、8 世紀那種表面很勻整、染色極精細的優質紙不見了。因而我們發現代之而用的（除了個別例外），是紙面粗糙、無光澤的淡褐色紙。字體雖然間或也蒼勁有力，但也失去了前一時期的那種雋永精妙”^⑪。

在我國入藏的標定日期為 9 世紀的寫卷中，最早的 1 件寫卷是偽經《新菩薩經》，入藏號為 $\Delta x - 299$ 號（本書 1313），標注日期為：“貞元拾玖年正月八日”，即 803 年 2 月 3 日。該寫卷的書寫用紙是：紙色淡褐，手感不太光滑。紙厚 0.105—0.115 毫米。網格大，每釐米 4 條線。很可能與另一偽經《勸善經》的 3 件寫卷（在倫敦藏品中，入藏號分別為 S.912、S.1349、S.3871 號）的紙質相似。3 件寫卷標注日期均為中國農曆紀年的同一年（在公元紀年中為 803 年或 804 年初）。翟理斯對 3 件寫卷紙的描述分別是：“紙質厚，紙色棕”、“紙色棕”、“紙面粗糙，紙色棕”^⑫。

第 2 件標注日期的寫卷，與倫敦藏品中的一組寫卷合為一套，入藏號為 $\Phi - 70$ 號（本書 886），內容為佛教經文：《瑜伽師地論》卷第四十二。該寫卷上有兩處日期：“寅年閏正月廿二日”（書寫日期），“大中十二年二月廿五日”（根據該寫卷講經的日期）。第二處日期，根據陳垣編輯的《中西回史日曆》，相當于 858 年 3 月 14 日。第一處日期中的干支相當于 858 年，這一年中也正好有閏月。但是，陳垣的《中西回史日曆》中的閏月，不是該寫卷附記中指出的陰

曆閏正月，而是閏二月。很可能是陳垣的《中西回史日曆》在此處不準確。這樣一來，第一處日期中的月、日應相當于 3 月 11 日，第二處日期中的月、日應相當于同年 4 月 12 日。因為很難設想在寫卷寫成之前即已依照寫卷進行講經。該寫卷的書寫用紙是：紙色微黃。紙質厚而脆。紙面光滑。紙厚 0.12—0.175 毫米。網格線彎曲，每釐米 5 條線。倫敦藏品中屬同一佛論不同卷的幾件標注日期的寫卷，即 857 年的 S.3927（卷第三十）、S.5309（卷第三十）、S.739（卷第三十五）；858 年的 S.5730（卷第四十五）；859 年的 S.6483（卷第五十五至五十六）^⑬，很可能是同一寫卷的不同部分，可資佐證的是：第一，紙質的基本特徵相似（“紙色棕，紙質脆”）。第二，我國的這件寫卷（卷第四十二）與卷第四十五的寫卷在書寫時間上屬同一年，即正好在卷第三十及卷第三十五之後、卷第五十五及卷第五十六之前。卷第四十五的這件寫卷寫于 858 年 6 月 27 日，也比我國這件寫卷時間遲。書寫順序在時間上如此嚴格的吻合，決非偶然。我們還要提及的，是上述佛論寫卷的 1 件殘卷，卷第三十四，入藏號為 $\Delta x - 1610$ 號（本書 2473）。這是 1 件成卷寫卷末尾的小殘卷，附記為：“大中十一年九[月]七日（即 857 年 9 月 28 日）比丘張明照隨聽寫記”。該寫卷無疑是同一佛論寫卷中的一件殘片，不僅是由于日期、紙質、字體等相符的緣故，而且還因為錄經僧名也相符。但是，在其他許多寫卷上，僅有錄經僧的名字明照，而錄經僧的姓氏在我國的這件殘卷上還是首次見到^⑭。該寫卷的書寫時間順序及卷號，在倫敦藏品中的 S.5309 號和 S.739 號之間。

上述幾件佛論寫卷，由於紙質與 8 世紀紙近似，所以是 9 世紀罕見的例外。而標注日期的其餘全部寫卷，或是文書，或是非正經著作，其書寫用紙都是各種非標準類型的劣質紙（10 世紀的紙也是這樣）。這些寫卷用紙的類型非常繁多，無法一一列舉，而且其中大部分寫卷都沒有確切的日期（如果不考慮干支紀年的話，因為

干支紀年六十年循環一次，在兩個世紀中可以遇到三四次）。因此，這些寫卷中僅有為數不多的幾件寫卷才能够作為在某種程度上確切地確定書寫日期的依據。為數不多的這幾件寫卷，下面我們一一加以分析研究。

Дх - 1287 號(本書 1641)寫卷，靈圖寺呈報官方當局的呈文。紙色灰。紙面不太光滑。厚 0.1—0.115 毫米。網格稍彎曲，每釐米 4 條線。寫卷上標注日期為：“中和四年甲辰歲四月 日”，即 884 年 5 月。

Дх - 1369 號(本書 1680)寫卷，僧善惠致師的信，書寫字體行草。紙色灰。紙質又厚又硬。紙面光滑。厚 0.12—0.135 毫米。網格勻整，每釐米 4 條線。信尾日期為：“文德元年十月十日”，即 888 年 11 月 17 日。

Дх - 599a 號(本書 1664)寫卷，靈圖寺僧慈光致法師請示講經時應持何解釋的信。紙色灰，有的地方稍發黃。紙質又厚又硬。紙面不太光滑。厚 0.16—0.23 毫米。無網格。標注日期為：“大順四季癸丑正月十八日”，“季”為“年”的古體字，即 893 年 2 月 8 日。雖然根據官方資料，大順年號止于 891 年，但是，敦煌寫卷中常見的情況是，年號變更後好多年，寫卷上仍沿用原來的年號標注日期。顯然，由於敦煌縣地處邊遠地區，又多次為非漢族所占，因而年號變更的消息，不一定能及時傳到。所以，標注日期是無可非議的，而且干支也與 893 年相符。寫卷背面為詩歌。

Дх - 1435 號(本書 1649)寫卷，官員李義簽署的官方文書。紙色淡褐。紙質厚。紙面不太光滑。厚 0.125—0.14 毫米。網格大，每釐米 4 條線。日期為：“乾寧二年十月十日”，即 895 年 10 月 31 日。加蓋朱印(篆書)：沙州乾寧使印。文書上的簽名李義，即敦煌(節度使)張承奉的副使李弘願^①。

從以上援引的 4 件寫卷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儘管 4 件寫卷有種種差別，但在 9 世紀末，非標準的粗紙有一種明顯的趨

勢：網格加寬，每釐米約 4 條線，而以前的標準是 5 條線。

10 世紀，特別是 10 世紀下半葉，更惹人注目的是，幾乎完全沒有優質紙，也沒有正經經典著作的寫卷。在翟理斯為 10 世紀前半葉編目的 94 件標注日期的寫卷中^②，正經經典寫卷共有 15 件，其中《觀世音經》寫卷 4 件，《金剛經》寫卷 6 件，《佛名經》寫卷 2 件。《佛名經》的各種不同文本均列出無數佛名，在該時期相當盛行，顯然是各種祈禱書之一。在翟理斯編目的 64 件 10 世紀後半葉的寫卷中^③，正經經典著作寫卷共有 7 件，其中《金剛經》寫卷 1 件，《佛名經》寫卷 1 件。而且，所有這些寫卷(除一、二件例外)書寫用紙全都是未染色紙：紙面粗糙，紙色微褐或棕，色調各異。看來，五代時期比 9 世紀紙張更缺。我們發現，其他著作中盛行的(比前幾世紀更盛行的)，是相當短小、也用于祈禱誦讀的偽經。

因此，我們要分析一下 10 世紀寫卷中首次出現的一種新方法。10 世紀初之前，全部敦煌寫卷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成卷的寫卷(著作內容廣博一些的全部寫卷都屬於這一類)，一類是寫在單張紙上的寫卷(文書及某些篇幅小的佛經)。顯而易見，誦讀成卷的寫卷，特別是在大道場上誦讀，由於必須把寫卷經常不斷地卷來卷去，所以不太方便。10 世紀，佛僧們發明了一種裝訂寫本的新方法，把寫本裝訂成冊頁本(一疊紙式的小冊子)。首先裝訂成冊頁本的，全都是《金剛經》寫卷，在倫敦藏品中標注日期為 905 年和 906 年(共 5 件寫卷)^④。

冊頁本上抄錄的，是在祈禱道場上誦讀的經文。冊頁本由數張小張紙對折而製成，紙質又粗又硬。折疊後形成的四面上全都寫經文，而且各張紙彼此間在折疊處黏合在一起。有時製成的冊頁本相當厚(例如，S. 5444 號寫卷用了這種折疊紙 29 張^⑤)。這是第一次使用新型冊頁本寫卷，便於快速查閱某一經文或某一經文中的所需之處。當時有這種冊頁本的佛僧，便無需隨身攜帶又笨又大的成卷寫卷。冊頁本中所看到的經文，全都是祈禱誦讀時最

必須的，如《金剛經》、《觀世音經》、偽經、陀羅尼經中的祈禱咒語、讚體詩等。讚體詩通常是道場等開場用的。寫卷裝訂成冊頁本是該寫卷的書寫時間不早于 10 世紀的可靠證據。幾乎全部冊頁本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字體不熟練，且忽大忽小。這就又一次證明，冊頁本上的經文是非職業抄錄人所寫，可以說，是供自己用的。

由于標注日期為 10 世紀的基本經文是文書、祈禱文等，因此，我國的藏品中標注日期為該時期的寫卷，主要也是文書和祈禱文。

Дх - 566 號(本書 823)寫卷，陀羅尼經文，標題為：《大佛頂如來放光悉怛多般怛羅大神力都攝一切咒王陀羅尼經大威德最勝金輪三昧神咒品》。紙面粗糙。紙色褐。手感不光滑。厚 0.12—0.155 毫米。網格不太清晰，每釐米 4—5 條線。纖維搗得不細碎。該寫卷上的日期為：“天復二年壬戌歲正月廿三日”，即 902 年 3 月 5 日。附記中指出，該寫卷的抄錄者(或供養者)為敦煌的歸義軍節度使張，即上面提到的張承奉。該寫卷是張承奉贈給寺院祈禱城隍避災消禍的。該寫卷也許與張議潮逝世 30 周年有關。張議潮是張承奉的祖先，于 849 年率領人民起義，解放了敦煌及周圍地區，擺脫了吐蕃的統治，此後便成為張氏家族中第一位獲得敦煌歸義軍節度使官銜的人，至 872 年逝世一直統治敦煌。張議潮的後裔便承襲了這一官銜^④。有趣的是，張承奉當年致住持僧的這封信至今仍存，也許與這一日期有關。這封信收藏在倫敦藏品中，入藏號為 S.1604^⑤。

Дх - 1414 號(本書 1566)寫卷，賣房契約。紙色淡褐，微發黃。紙質又厚又硬。紙面不太光滑。厚 0.13—0.20 毫米。網格勻整，每釐米 5 條線。日期為：“天復陸年丙寅歲拾壹[月]……”，即 906 年 11 月或 12 月。

Дх - 295a(本書 1403)寫卷，祈禱文，背面有麵、油、酒支出單。紙色暗褐，呈淡粉紅色調。紙質厚。紙面不光滑。厚 0.13—0.16 毫米。有許多未搗碎纖維的地方，厚約 0.35 毫米。網格彎曲，每

釐米 5 條線。祈禱文尾日期為：“天復十年庚午歲次三月十五日”，即 910 年 4 月 27 日。附記中所指出的天復年號，于 904 年已改元為另一年號，唐朝覆亡是 907 年。該文書中仍舊按天復年號計算年份，顯然說明了，或者是敦煌的統治者未承認取代唐朝的梁朝，或者是當時消息閉塞。不過，第一種可能性更為可信。

Дх - 1409 號(本書 1565)寫卷，借債契約。紙色淡褐，呈微黃色調。紙質厚。紙面不光滑。厚 0.105—0.155 毫米。網格勻整。每釐米 4—5 條線。日期為：“貞明陸年歲在庚辰拾壹月貳拾[肆]日”，即 921 年 1 月 5 日。

上面描述的這幾件寫卷屬於 10 世紀前半葉，其總體特徵是：紙面粗糙一些。紙色褐，色調各異。紙面不光滑。網格大，每釐米 4—5 條線。紙質厚薄不勻，介于 0.12—0.2 毫米之間。

在我國的藏品中，標注日期為 10 世紀後半葉的寫卷僅僅有一種類型：Дх - 1362 號(本書 1706)寫卷，這是從寫卷主要經文上剪下來的錄經僧附記，該寫卷抄錄的很可能是某一佛教正經經文。寫卷用紙是：紙色褐。紙質又厚又脆。紙面光滑。厚 0.085—0.095 毫米。網格勻整，每釐米 3—4 條線。附記中日期為：“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次三月十五日”，即 978 年 4 月 20 日。

該寫卷證明，10 世紀末(顯然是由于 960 年宋朝統一中國)優質好紙產量增加，但同 9 世紀前一樣，未染成黃色。Ф - 32 號(本書 118)寫卷也證實了這一點。該寫卷的經文內容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百四十七。紙色微黃。紙質又厚又脆。紙面光滑。厚 0.11—0.145 毫米。網格勻整，每釐米 5—6 條線。該寫卷又附加 2 張紙，內容是 2 篇類似的經文，通告敦煌統治者曹宗壽(自稱為敦煌王)及其妻氾氏，為報恩寺補寫經卷所採取的措施。這 2 件文書很可能都是奉上述 2 人指示所抄錄的經文的附記，而這 2 件文書上有同一日期：“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五月十五日”，即 1002 年 6 月 28 日。雖然 Ф - 32 號

寫卷的抄錄時間，比 Дх - 1362 號晚 25 年，但是 2 件寫卷的紙質却是相似的。我們在倫敦藏的 2 件寫卷中也發現了這種證據，證實宋朝時優質紙的產量不斷增加。1 件寫卷是 S. 6734 號，986 年，經文是佛經《思益經》卷第三，翟理斯描述的紙質基本特徵是：“紙質脆，紙色黃”；另 1 件寫卷是 S. 3985 號，本文是 989 年的日曆，翟理斯描述的紙質基本特徵是：“紙色淺黃”^⑩。

因此，我們再分析 1 件 Φ - 96 號(本書 1470)寫卷。該寫卷儘管沒有標注日期，但可能是屬於 10 世紀後半葉(確切地說是後 30 年)的，也可能是屬於 11 世紀初葉的。這是因為，該寫卷的紙質與上面描述的 2 件寫卷類似。這件 Φ - 96 號寫卷，是 3 件黏貼在一起的《大方便佛報恩經》變文寫卷。寫卷上表明，這是稱為變文的卷第三、第七、第十一。一般來說，變文不是正經經典著作。而 Φ - 96 號寫卷用優質好紙書寫，說明這種紙張在 10 世紀末 11 世紀初相當流行。

Дх - 1400a、б 號(本書 1629、1408)寫卷，很可能屬於 10 世紀。該寫卷正面寫的是 2 件官方呈文：1 件是名叫張保勳的官吏的稟帖，1 件是自稱“弱婢員娘祐定”的婦女的呈文，其中後 2 字(祐定)是名字。該寫卷背面寫的是 3 件祈禱文。該寫卷書寫用紙是：紙色灰，紙質又粗又硬，手感不光滑，厚 0.20—0.345 毫米。網格大，但不清晰，每釐米 4 條綫。正面 2 件文書標注日期為：“天壽二年九月 日”。在已知的年號中，只有一個年號與此 2 件文書中指出的天壽年號相同^⑪。該年號，是為唐朝所滅的短暫小國之一的國君于 618—619 年定的。但是，該寫卷的紙質和字體，都明顯地與 7 世紀初不相符。而且，用這個遠離敦煌的國家的國君年號為文書標注日期，也未必可信。根據所有的資料，該寫卷應該是屬於 10 世紀的。我們這裏遇到的是各種紀年表中未見著錄的五代時期(908—960 年)為數衆多、很快滅亡的一個國家統治者的年號^⑫。因此，這是 1 件特殊事例，即根據紙質和字體得出年號的時間，而

不是反過來根據年號來確定寫卷的時間。

此外，在我國的藏品中還有件寫卷，雖然寫卷上沒有寫任何日期，但仍然能够標注出比較確切的日期。這是件成卷的寫卷，入藏號為 Φ - 229a、б(本書 63、897、829)，正面寫的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九十二；背面寫的是兩部著作本文：一部是佛教禪宗史書《景德傳燈錄》卷十一，一部是《大悲心陀羅尼答請》。背面的第一部著作寫于 11 世紀初，成書後的 1006 年作者贈獻給真宗(998—1022 年)^⑬。因此，背面寫卷的日期不可能早于 1006 年，也未必會是 1036 年之後寫的，因為那年由于西夏党項人的侵占，僧人便預先將藏經洞封死了^⑭。在該寫卷中，我們遇到一些漢字的特殊寫法。這些特殊寫法，以前在敦煌寫卷中未曾見過，我們認為可以作為確定 11 世紀初葉寫卷的標準。問題是，許多字都有固定的、通用的寫法，至少是 7—10 世紀特有的寫法。這些字形雖然和現在的傳統字形很近似，但仍然有很多惹人注目的不同之處。顯然，在宋朝初期進行了一些改革，旨在統一漢字的書寫形體和印刷形體。不管怎樣，在 Φ - 229 號寫卷中，沒有用上述各種異體字，用的漢字已經是後來傳至現代的傳統寫法，正面寫卷比背面本文書寫時間要早得多。該寫卷的紙質，與克拉珀頓研究的 673 年的寫卷完全相符(參看上面確定 7 世紀後半葉紙質特點時援引克拉珀頓的描述)。正面寫卷應該確定的日期，很可能是 7 世紀末至 8 世紀初。

以上所述，就是我們根據我國所藏敦煌寫卷文獻有標注日期的寫卷，以及克拉珀頓和翟理斯對倫敦藏品中類似的有標注日期寫卷的研究，確定的寫卷特點。我們發現，對紙色基本特徵的描述，我們和上述兩位研究者有所不同。他們兩位所確定的不同色調的棕色，我們往往設法用不同色調的褐色或黃色來描述。這在把我國藏品的寫卷資料和倫敦藏品的寫卷資料進行對比時，總是需要指出的。大體上說，本書的匯總表可以作為根據外觀資料(紙

質、字體、畫行等)標定寫卷日期的相當可靠的依據,有時精確到一世紀,有時精確到半世紀。我們期望在我們編著的敘錄中,從第三冊起後幾冊均使用本文所得到的資料。我們認為,在後幾冊敘錄中,確定寫卷的書寫時間將會比第一、二冊中更準確一些,因為在編著第一、二冊時,我們這方面的經驗尚嫌不足。

本文的匯總資料,參看附表二。

作為本文研究基礎的寫卷(或部分寫卷)照片附在本書的後面^⑫。

孟列夫(Л.Н.緬希科夫)
(袁席箴 譯 王國勇 校)

注釋:

① 《中國歷史參考圖譜》,鄭振鐸編輯,第一至第二十四輯,上海出版公司,1950年以下簡稱:鄭振鐸,《圖譜》。

② 鄭振鐸,《圖譜》,第十二輯,圖版第41,第172圖,176—183圖。

③ R. H. 克拉珀頓,《紙——歷史資料記》,牛津,1934年,第1—26頁。

④ 翟理斯,《斯坦因搜集的標注日期的漢文寫卷》,BSOAS,第七卷,1935年,第809—836頁;第八卷,1936年,第1—26頁;第九卷,1937年,第1023—1046頁;第十卷,1940年,第317—344頁;第十一卷,1943年,第148—173頁。

⑤ 翟理斯,《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敘錄》,倫敦,1957年,第16頁。

⑥ 按歷史年表確定中國紀元日和相應日期:陳垣,《中西回史日曆》,第一至第五冊,北京,1926年。1962年再版。

⑦ 鄭振鐸,《圖譜》,第九輯,圖版第21,第71圖。

⑧ “大體可以說,我們所知道的5世紀甚至最早期的紙,質地也是極好的;這種紙通常是微呈暗褐色的,因為5世紀以前似乎不使用染色物。”(翟理斯,《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敘錄》,第11頁。)但是,翟理斯所忽略的是,在他所編目的藏品中,479年的1件寫卷(同上,4435),用的是已經染色的黃色薄紙。因此,紙張染色應起始于5世紀最後25年。

⑨ 參看:翟理斯,《斯坦因搜集的標注日期的漢文寫卷》,BSOAS,第七卷,第四部分,第811—812頁。

⑩ 鄭振鐸,《圖譜》,第九輯,圖版第21,第73圖,其中影印的是414年的1件寫卷。

⑪ 該寫卷的字體,與405年立的《建寧太守爨寶子碑》上的字體很近似(儘管不能說完全相同)。參看:鄭振鐸,《圖譜》,第八輯,圖版第10,第36圖;楊殿珣,《石刻題跋索引》,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29頁。又,作者中文版加注:最近發現《敦煌寶藏》(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140冊,第825頁收有香港張虹先生原藏《太上玄元道德經》抄本影印件,原件今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該寫卷的書法及其他特色與Дx-2111卷完全一致。該卷并有後記曰:“建衡二年庚寅五月五日敦煌郡索紈寫已”。據《中西回史日曆》,公曆當是270年6月9日。如此,則Дx-2111卷也應是3世紀末或4世紀初遺物。但是,饒宗頤先生疑該《太上玄元道德經》卷是偽品,不知有何依據。

⑫ 翟理斯在其《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敘錄》中稱該紙為“紙質薄,紙色黃”。

⑬ 摘自:翟理斯,《斯坦因搜集的標注日期的漢文寫卷》,BSOAS,第七卷,第四部分,第814—815頁。染成黃色時,加進漢語稱為“雌黃”的有毒物質,以保護寫卷防止蟲蛀。參看《古今圖書集成》,卷六五四,第35頁B,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

⑭ 翟理斯,《斯坦因搜集的標注日期的漢文寫卷》,BSOAS,第七卷,第四部分,第816—817頁。

⑮ 鄭振鐸,《圖譜》,第九輯,圖版第21,第75圖。

⑯ 同⑭,第824頁。

⑰ 同上,第827頁。

⑱ 翟理斯,《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敘錄》,第11頁。

⑲ 翟理斯,《斯坦因搜集的標注日期的漢文寫卷》,BSOAS,第七卷,第四部分,第809頁。

⑳ 同上,第829—830頁。

㉑ 由于翟理斯對紙質基本特徵的描述極為簡單,如“紙色淡黃”(同上,第834頁),“紙色黃,紙質好”(第829頁),“紙色微白”(第831頁)等,很難說,翟理斯把這兩種類型的紙與哪一種紙看作是一樣的。

㉒ 翟理斯,《斯坦因搜集的標注日期的漢文寫卷》,BSOAS,第八卷,第一

部分,第 2—3 頁。

㉓ 翟理斯,《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敘錄》,第 11 頁。

㉔ 摘自:翟理斯,《斯坦因搜集的標注日期的漢文寫卷》,BSOAS,第八卷,第一部分,第 15—16 頁。

㉕ 我們沒有談及紙的成分(克拉珀頓認為,第一種類型紙的成分是“楮樹皮和苧麻”),因為我們在鑒定紙的成分時,沒有可能在實踐中使用這些資料(克拉珀頓是用顯微攝影分析法確定成分的)。

㉖ 同㉔,第 19—20 頁。

㉗ 有關諱字的著作有新舊兩種匯編。其中舊匯編有:陸費墀,《歷代帝王廟謚年譜》,收入《四部備要》,精裝第 49 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新匯編有:陳垣,《史諱舉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年。

㉘ 發表該寫卷的著作為:《維摩詰經變文·維摩碎金·十吉相》,影印原文,孟列夫撰寫前言及編輯、翻譯、注釋原文,莫斯科,東方文學出版社,1963 年,收入《東方古代文獻》,小叢書,第八種。

㉙ 翟理斯指出,在標注日期為武后執政時期的寫卷中,包含有這些字形的第一件寫卷是屬於 691 年的,而進行字形改革為 689 年。(參看:翟理斯,《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敘錄》,第 13 頁)。因此,起始日期可能是 689 年。但是,芳村修基指出,首先使用這些字的是在敦煌 137 號窟(謝稚柳的編目號;伯希和的編目為 149 號窟),標注日期為 686 年。參看:芳村修基,《徵心行路難殘考錄》,收入《西域文化研究》,第一,京都,法藏館,1958 年,第 192 頁;同時參看:謝稚柳,《敦煌藝術敘錄》,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年,第 190 頁。

㉚ 可以查到這種字形的有下列著作:《古今圖書集成》,卷六四三,第 3 頁 A—B。其中列舉了歷史著作中的全部字形;《續通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第 3704 頁。其中可以查到對《古今圖書集成》中所引資料的某些補充;以及鄭振鐸編輯的《中國歷史參考圖譜》,第十輯,圖版第 23,第 82 圖。在歐洲的一些著作中,轉載有包括武后執政時期特殊字形的原文。參看:沙畹,《中國象形文字的考古考察》,第一卷,巴黎,1909 年,第 542—543 頁;翟理斯,《斯坦因搜集的標定日期的漢文寫卷》,BSOAS,第八卷,第一部分,第 21 頁,續頁。此外,有些異體字是根據寫卷直接確定的。

㉛ 參看:翟理斯,《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敘錄》,1242,1715,1936,

2102,2104,2105,2107,2199,2316,3006,3563,3863,4319,5407,5477,6767,6800,6830,6845,7054,7239,7876。

㉜ 我們發現,在寫卷中年代不寫漢字“年”,而寫“載”,可以作為一條證據,證明該寫卷書寫日期不早于 744 年(參看:同上,5670)。

㉝ 顯然,與這種紙相關的,是倫敦藏品中的下列特徵:“紙質又薄又軟,紙色微白”(5563,772 年);“紙質薄,紙色棕”(7516,763 年)。

㉞ 同上,7374。

㉟ 參看:翟理斯,《斯坦因搜集的標定日期的漢文寫卷》,BSOAS,第九卷。

㉛ 翟理斯,《斯坦因搜集的標定日期的漢文寫卷》,BSOAS,第九卷,第二部分,第 317 頁。

㉜ 翟理斯,《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敘錄》,5299,5301,5305。

㉝ 翟理斯,《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敘錄》,4270,4271,4273,4280,4284。

㉞ 參看附注㉝中的翟理斯目錄號,同時參看:陳垣,《敦煌劫餘錄》,北平,1931 年,第 436 頁 B。

㉟ 試比較:翟理斯,《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敘錄》,5748,其中提到他的名字,官銜相同,年份相同。

㉛ 翟理斯,《斯坦因搜集的標定日期的漢文寫卷》,BSOAS,第十卷,1940 年,第 317—344 頁。

㉜ 同上,BSOAS,第十一卷,1943 年,第 148—173 頁。

㉝ 同上,BSOAS,第十卷,第二部分,第 319—321 頁。

㉞ 翟理斯,《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敘錄》,1355。

㉟ 張議潮後裔中最後一人承襲這一官銜是 907—911 年。有關張議潮及其家族的情況,參看:羅振玉,《張義朝傳》,收入《雪堂叢刊》,1915 年,第四卷,第一分冊,第 6 頁。以後所有的作者均使用這一研究資料。

㉛ 翟理斯,《斯坦因搜集的標定日期的漢文寫卷》,BSOAS,第十卷,第二部分,第 318 頁。

㉜ 翟理斯,《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敘錄》,3685,7048。

㉝ 參看收錄已知的紀年年號最全的最新中國歷史紀年表:榮孟源,《中國歷史紀年》,北京,三聯書店,1956 年,第 54 頁;湯有恩,《公元干支推算表》,

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21頁。

④ 這并非唯一的一件事例,在敦煌寫卷中常常遇到未見著錄的年號。例如年號“天興”,也是屬於10世紀的,參看:翟理斯,《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敘錄》,6640。現據藤枝晃意見,這是與于闐有關的抄本與年號。

⑤ 參看:南條文雄,《佛經三藏中譯本目錄及中國日本佛教聖徒錄》,牛津,1883年,1524。

⑥ 在巴黎圖書館伯希和藏品中,發現有一件標注日期最晚的敦煌寫卷,屬於1035年。(參看:翟理斯,《斯坦因搜集的標定日期的漢文寫卷》,BSOAS,第七卷,第四部分,第809頁)1036年,是西夏党項人占領敦煌(沙州)的年份。參看:E.I.克恰諾夫,《十一世紀上半葉西夏一回鶻戰爭》,《瓦利哈諾夫歷史考古民族學研究所叢刊》15卷,阿拉木圖,1962年,第150頁。

⑦ 本書第二冊付印工作準備就緒之後,又收到藤枝晃教授的3部著作,很遺憾,這3部著作的資料未能吸收進去。這3部著作是:《敦煌寫經的字體》,墨美,1960年,97;《北朝寫經的字體》,墨美,1962年,119;《大谷大學所藏敦煌本〈華嚴經〉卷第四十七解題》,墨美,1962年,120。

附表一

武后執政時期(684—704年)規定的漢字

序號	漢字	武后新字
1	天	𠀤
2	地	𠀤
3	日	𠀤
4	月	𠀤
5	星	○
6	君	𠀤
7	年	𠀤
8	正	𠔁
9	臣	思
10	戴	𧆸
11	載	𠔁
12	國	𠀤
13	初	𠔁
14	證	鑿
15	授	鰱
16	人	𠔁
17	聖	𡇠
18	生	𠀤
19	照	𡇠

附表二

以年代為序排列的敦煌寫卷紙質、畫行的特徵

序號	寫卷的 人藏號	書寫日期	紙				質			畫 行
			紙色、質地 (脆、軟)	紙 面	厚度(毫米)	網格(每 釐米幾 條數)	橫連線 間 距			
1	Дх-2111	4世紀末— 5世紀初	紙色褐	光滑	0.09—0.14	—	—	粗,墨汁— 般濃度		
2	S.797	406年	紙色微褐棕	光滑	?	4	—	?		
3	Φ-320	434年(?)	紙色微褐	光滑	0.12—0.16	6—7	—	粗,墨汁— 般濃度		
4	S.81	506年	紙色淡棕, 紙質脆	光滑	0.05—0.06	10	13	?		
5	Дх-557	6世紀前半 葉	紙色褐,紙 質脆	不光滑	0.055—0.07	7—8	—	細,墨汁— 般濃度		

(續表)

序號	寫卷的 人藏號	書寫日期	紙				質			畫 行
			紙色、質地 (脆、軟)	紙 面	厚度(毫米)	網格(每 釐米幾 條數)	橫連線 間 距			
6	S.2216	541年	紙色金黃, 紙質脆	光滑,匀整	0.05—0.06	6—7	4.5—5	?		
7	Дх-2561	6世紀後半 葉	紙色淺黃, 紙質稍脆	光滑,匀整	0.055—0.07	7—8	—	細,淡筆		
8	Дх-161	6世紀後半 葉	紙色淡黃, 紙質稍脆	光滑	0.055—0.07	6	—	細,淡筆		
9	Φ-69	608年	紙色鮮黃, 紙質脆	光滑	0.07—0.08	7	—	—		
10	Дх-2186	7世紀前半 葉(?)	紙色微褐黃	光滑	0.075—0.089	8	—	細,淡筆		
11	Дх-2742	7世紀前半 葉(?)	紙色淡黃	不太光滑	0.095—0.11	7	—	細,淡筆		

(續表)

序號	寫卷的 人藏號	書寫日期	紙 質				畫 行
			紙色、質地 (脆、軟)	紙 面	厚度(毫米)	網格(每 釐米縫 條數)	
12	Дх-754	7世紀前半 葉(?)	紙色黃	光滑	0.05—0.065	7	— 細, 淡筆
13	S.2573 S.312	673年	紙色暗棕	很光滑	0.1	反射光見 下能格	— ?
14	Дх-1871	7世紀後半 葉(?)	紙色暗黃	光滑, 略帶 油質	0.09—0.1	6—7	4.5—6 細, 淡筆
15	Φ-68	678年	紙色白, 略 發微黃, 紙 質軟	柔軟而光滑	0.17—0.19	10	2.5—8 —
16	Φ-4 Φ-5 Φ-12 Φ-29 Дх-49	684—704年	由微黃, 紙質 到微黃, 紙質 稍脆	光滑	0.95—0.135	5—6	5—6 細, 淡筆

(續表)

序號	寫卷的 人藏號	書寫日期	紙 質				畫 行
			紙色、質地 (脆、軟)	紙 面	厚度(毫米)	網格(每 釐米縫 條數)	
17	Дх-835 Дх-1370 Дх-2152 Дх-2557	684—704年	微褐灰	粗糙, 不光 滑	0.12—0.225	5	— —
18	Дх-354а, г, д, е	721年	紙色淡黃, 發微褐	不光滑	0.085—0.115	5	5.5— 7.5 —
19	Дх-3546	721年	紙色暗微褐	不光滑	0.135—0.165	5	— —
20	Дх-354в	721年	紙色暗青 褐, 有些發 青	很粗糙	0.145—0.165	5	— —
21	Φ-235	733年	紙色白, 微 發黃, 紙質 軟	不太光滑	0.11—0.125	—	— —

(續表)

序號	寫卷的 入藏號	書寫日期	紙 質				畫 行
			紙色、質地 (脆、軟)	紙 面	厚度(毫米)	網格(每 釐米幾 條數)	
22	Φ-256	771年	紙色白，微 發黃，紙質 軟	不光滑	0.135—0.145	—	—
23	Дх-1328	782年	紙色淡黃， 微發粉紅	不太光滑	0.085—0.095	5或者 8—9	—
24	Дх-299	803年	紙色淺微褐	不太光滑	0.105—0.115	4	—
25	Дх-1610	857年	紙質脆	光滑	0.12—0.175	5	細，淡筆
26	Φ-70	858年	紙色微黃	光滑	0.12—0.175	5	細，淡筆

(續表)

序號	寫卷的 入藏號	書寫日期	紙 質				畫 行
			紙色、質地 (脆、軟)	紙 面	厚度(毫米)	網格(每 釐米幾 條數)	
27	Дх-1287	884年	紙色灰	不太光滑	0.1—0.115	4	—
28	Дх-1369	888年	紙色灰，紙 質硬	光滑	0.12—0.135	4	—
29	Дх-599а	893年	紙色灰，微 發黃，紙質 硬	不太光滑	0.16—0.23	—	—
30	Дх-1435	895年	紙色淺微褐	不太光滑	0.125—0.14	4	—
31	Дх-566	902年	紙色微褐	粗糙，不光 滑	0.12—0.155	4—5	—

(續表)

序號	寫卷的 人藏號	書寫日期	紙			質		畫行
			紙色 (質地 (脆、軟))	紙面	厚度(毫米)	網格(每 釐米綫 條數)	橫連綫 間距	
32	Дх~1414	906年	紙色淺 褐，微發黃， 紙質硬	不太光滑	0.13—0.20	5		
33	Дх~295а	910年	紙色暗 褐，微發粉 紅	不光滑	0.13—0.16, 有時約0.35	5		
34	Дх~1409	920年	紙色淺 褐，微發黃	不光滑	0.105—0.155	4—5		
35	Дх~1362	978年	紙色微褐， 紙質脆	光滑	0.85—0.95	3—4	稍粗，淡筆	
36	Ф~32а	1002年	紙色微黃， 紙質脆	光滑	0.11—0.145	5—6	稍粗，淡筆	